

●本刊特稿

中国近代儒商的形成和近代儒商文化的内涵及特征

徐国利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儒商是以儒家思想作为经营管理准则和生活指导,有良好品德和专业知识并取得成就的商人。伴随着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在近代民族企业家中产生了中国近代儒商。他们既积极吸收近代西方工商业思想和科学管理,又全力继承传统儒商文化,建构近代儒商文化。近代儒商文化主要包括七个方面内容。与西方近代商业文化片面崇尚功利性的工具理性不同,近代儒商文化弘扬儒家人文精神,将道德性的价值理性和功利性的工具理性相统一,提出了义利合一和义利并重的义利观,形成了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商业文化。

关键词:中国近代儒商;近代儒商文化;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义利观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730(2021)01-0001-10

收稿日期:2020-07-22

DOI:10.13757/j.cnki.cn34-1329/c.2021.01.001

基金项目:中国孔子基金会、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儒商高等研究院合作项目“中国现代儒商评价体系”(2018110020)。

作者简介:徐国利,男,安徽祁门人,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国际儒商高等研究院研究员,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儒商是以儒家思想作为经营管理准则和生活指导,有良好品德和专业知识并取得成就的商人。儒商初步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在秦汉至隋唐时期陷入停滞,两宋时期得以复兴,明清时期走向兴盛。随着中国古代儒商的发展,随之形成了传统儒商文化^①。进入近代以来,伴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中国近代儒商形成。中国近代儒商产生于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爱国实业家中。他们既积极吸收近代西方工商业思想和科学管理,又继承传统儒商

文化,建构起近代儒商文化。近代儒商文化主要包括七方面内容:传承儒家仁道精神、秉承义利合一的经营之道、以诚信为本和做忠信之商、富有克己敬业精神和勤俭守成的美德、有浓厚家国情怀和倡行实业救国、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热心公益慈善事业。与西方近代商业文化片面崇尚工具理性不同,近代儒商文化弘扬儒家人文精神,将道德性的价值理性和功利性的工具理性相统一,富有民族文化特色。学术界对近代儒商缺乏整体性研究,仅有少量个案研究^②,故此本文拟

①学术界目前对近代儒商和近代儒商文化的研究相当薄弱。研究专著仅有朱仲颐的《中国近现代儒商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然而此书缺乏学术性,仅介绍了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发展和一些企业家的成就,缺乏儒商研究的视角,所引史料无注释或参考资料来源。朱宗震的《黄炎培与近代中国的儒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分章叙述和评析了近代著名儒商张謇、卢作孚、范旭东、陈嘉庚、黄炎培的儒商思想与商业成就。此外,儒商个案研究、中国近代商业史、中国近代史、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企业伦理学的研究著述对近代儒商偶有论及。戴斗勇认为近代儒商是中国儒商发展的成熟阶段,有五个特点(戴斗勇:《儒商精神》,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37-47页。)章开沅等主编的《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研究(1860—1919)》(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马敏的《商人精神的嬗变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商人观念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从儒商视角对张謇和经元善等清末民初民族资产阶级有一定的分析。刘光明简要介绍了中国近代儒商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刘光明:《新商业伦理学》,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年版,第13-14页。)整体性研究论文很少,仅有施祖军论述了近代儒商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及其内涵,但太简略,全文仅3千多字。(施祖军:《中国近代商业伦理精神的形成与发展》,《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绝大多数是个案研究。其中,有关张謇的研究最多,主要有彭安玉:《论张謇的儒商本色》(《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郭世佑:《张謇:从儒生到儒商》(《法人》2006年第8期);陈卫平:《张謇的儒商精神对当代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启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吕安兴:《张謇的儒商伦理思想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9期);徐静玉:《试论张謇儒商精神的特点》(《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个别论文探讨其它近代儒商的思想,主要有:朱宗震的《黄炎培和儒商伦理》(《探索与争鸣》2003年第8期),王芙蓉的《张元济的儒商出版思想——兼及对当代中国民营出版业的启示》(《苏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对中国近代儒商的形成和近代儒商文化的内涵和特色进行初步研究。

一、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和中国近代儒商的形成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刺激下,19世纪70年代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了。伴随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形成了近代民族资产阶级。大批近代实业家既吸收西方资本主义经营管理制度和先进科学技术,又继承传统儒商精神和经营管理方式从事商业经营,中国近代儒商由此形成。

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是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两次鸦片战争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入侵的刺激,传统的自然经济在沿海沿江口岸地区逐步瓦解,六七十年代清政府开始了求富求强的洋务运动。在这些因素的交织作用下,东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通商口岸的一些官僚、地主、卖办和商人开始投资创办近代企业,从中产生了中国近代最早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有郑观应、陈启沅、徐润、马建忠、陈联泰、王炽、孟洛川等。甲午战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即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民族资本主义得到较快发展。原因是甲午战后国门大开,成为西方列强的势力范围,它们对中国大量输出资本和商品,导致了自然经济的加速瓦解。同时,清政府加快自强步伐,放宽民间设厂限制,采取多种政策和措施推进实业发展。这一时期民族危机的空前加剧则使“实业救国”思想高涨,形成“实业救国”热潮,许多实业家开厂矿和办企业,走救实业救国的道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得到较快发展,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清末民初的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和预备立宪等政治革命与社会变革都有大量民族资产阶级参与。其中的代表人物有张謇、经元善、盛宣怀、张振勋和张元济等。1914—1919年的“一战”前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迎来“短暂春天”(亦称“黄金时代”)。1912年1月辛亥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结束了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统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均采取了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政

策和措施,大大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战”期间欧美列强和日本忙于战争,不仅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还需要中国市场为其提供大量商品,使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获得有利的环境。同时,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特别是收回利权、抵制日货和提倡国货运动等也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使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迅速壮大,涌现出一大批著名民族企业家,代表人物有荣德生和荣敬宗兄弟、叶澄衷、周学熙、宋则久、蔡声白、陆费逵、张嘉猷、吕岳泉、简照南和简玉阶兄弟等。不过,好景不长。“一战”后外国资本主义卷土重来,中国重新成为列强经济侵略的目标。它们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低价竞争打压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发展陷入萧条期。1927年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建立,1928年12月“东北易帜”后全国基本统一,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发展经济,鼓励民营经济发展。“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再次加剧,民众抵制洋货和提倡国货的运动此起彼伏。上述诸多因素的叠加作用,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到1936年,国民生产总值创历史纪录。其中,民族资本崛起,民族工业资本年均增长率超过8%,民营企业在纺织、煤炭、水泥和电力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非垄断领域占有产业优势^[2]。这一时期涌现大批著名企业家,代表人物有卢作孚、穆藕初、陈嘉庚、范旭东、吴蕴初、刘鸿生、宋棐卿、陈光甫、周作民、史量才、方液仙、杜重远、冼冠生、胡西园、郭乐和郭泉兄弟等。抗战爆发后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受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的严重摧残,加上官僚资本的沉重压榨,民族资本发展再次遭受沉重打击,经济实力全面萎缩,大批工厂企业破产倒闭。然而,作为中国近代进步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空前活跃,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民主运动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主革命,成为民族民主革命的重要力量。总之,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为中国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民主革命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①

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培育出一批

①关于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和实业家的研究,参见章开沅、马敏、朱英主编:《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研究 1860—1919》,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黄逸峰、姜铎等编著:《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吴序光主编:《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儒商式的近代民族企业家。他们既积极吸纳西方经营管理思想和科学技术,又继承和弘扬传统儒商文化,走“实业救国”之路。清末民初,由于商人社会地位的日益提升,儒与商、士与商、绅与商交融的趋势更加明显,绅商这一新社会阶层应运而生。所谓绅商,是指那些既有功名职衔、又经营工商业的商人。他们集社会政治地位与雄厚财力于一身,逐渐取代传统绅士,成为清末民初大中城市和部分乡镇最活跃和最有权势的社会阶层。据估算,这些绅商有5万人左右,占绅士阶层人数的3.3%^[3]。在绅商中,那些以儒家思想经商者便是儒商。到20世纪30年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更是催生出一批著名的民族企业集团,儒商化的近代企业家群体颇具声势。如以经营面粉和纺织业为主的荣德生、荣宗敬的荣氏企业集团,以发展化学工业闻名海内外的范旭东的“永(利)久(大)黄(海)”企业集团,以经营毛纺织品为主的宋棐卿的东亚毛麻纺织公司,以经营长江轮船运输业出名的卢作孚的民生企业集团,以经营食品称雄的洗冠生的冠生园集团,首创中国商业储蓄和将旅游企业化的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从事银行业的周作民的金城银行,专做烟草业的简照南、简玉阶的南洋烟草公司,以开办百货商店和纺织业闻名的郭氏家族的永安纺织企业集团,等等。^①

中国近代许多民族企业家倡导“商儒”不分,如清末民初实业家张謇便明言“言商仍向儒”^[4]。他以儒家义利观为经营原则,说:“人之道徳,端赖养成。寻常商业,虽卖贵买贱,皆有计心,而利己损人,必为众弃。”^[5]^[202]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创建人和著名业家经元善,自述其心志是以儒学、特别是阳明心学为本:“元善束发授书,长而服贾,寡学不文,未青一襟,惟四子书幼读颇熟。壮岁以后,私淑乡先贤阳明心学,渐能淡于荣利,论是非利害。”^[6]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说:“自知余生有几,亟须勤学励志,乃以王文成全书,回环三复,知先贤得力,全在物我无间四字,乃能成就盖世勋业……此关即破,自然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心志湛然莹澈。”^[7]^[232]荣氏兄弟以儒家思想作为经商信念和原则。荣德生说:“古之圣贤,其言行不外《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正心修身,终至国

治而天下平。吾辈办事业,亦犹是也,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8]^[150]他极为重视对企业职工进行传统道德教育,亲自主持、手订纲目和聘请专家撰写出《人道须知》,印行数万册,在员工中广为散发。该书分孝悌、忠信、礼仪、廉耻、家庭、生活、自治、处世八卷,倡导孝悌、忠信、礼仪、廉耻。著名棉纺业家穆藕初大力引进和推行“近代科学管理之父”美国管理学家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却又主张以儒家文化唤起中国商人的“天职”观,说:“此‘天职’二字并非新名词,即孟子所谓‘古之人修其天爵者’是。人不论托业何途,对于所立地位,皆有发达其业务之天职,必如是方可以无愧乎为职业家。”^[9]著名银行家陈光甫既采西式方法来管理银行,又重视儒家伦理的作用,说:“近来阅观世故,愈了解古人日常道德之训,永远是真。盖道德非他,乃维持团体合作之必要条件。忠、诚、廉、让四字,余觉其特与商业团体有关。”^[10]

可见,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在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兴办和经营近代企业时,仍强调儒家思想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将中西文化融合到近代企业经营管理中,建构起中国近代儒商文化,实现了传统儒商的近代转型。

二、近代儒商文化的内涵及其基本内容

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在创办和发展近代实业过程中,重视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建构起富有近代精神的儒商文化。考察和分析他们的经营理念、企业精神和经济实践,可见近代儒商文化的内涵及其基本内容主要有七个方面:

一是传承和弘扬儒家仁道精神。近代儒商兴办近代新式工商业,却仍恪守儒家信条与道德规范。经元善说:“三十岁前,从大学之道起,至无有乎尔,经注均能默诵。故终身立志行事,愿学圣贤,不敢背儒门宗旨。”^[11]他认为要在商业上建立盖世勋业,“惟将妻孥室家渐渐看淡,欲退则理进,由是亲亲仁仁之意渐渐加浓,久之,益明乎天寿不二,修身以俟。”^[7]^[232]荣德生认为,要想取得商业成功就必须弘扬儒家仁道,“古之圣贤,其言行不外

^①关于中国近代实业家的整体性研究,可参见罗荣祥主编:《创业、抗争、开拓——近代中国民族企业家述评》,山东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邱志华编著:《裂缝与夹缝——中国近代企业家的生存智慧》,立信会计出版社1996年版;阎春红编著:《中国近代实业家》,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

《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正心修身，终至国治而天下平。吾辈办事业，亦犹是也，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8]150}不少企业家将体现儒家仁道的思想写入“行训”和“厂训”等，使之成为企业精神和经营原则。天津东亚毛纺公司的“厂训”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得，必先予人”^[12]，彰显了儒家的仁道精神。天津华新纱厂要求员工“尚勤、尚实、尚公、尚廉、各秉血忱，拔除旧习，坚忍持久”^[13]。天津国货售品所确立“爱人、惜物、忠事、守章、耐久”的所训^[14]。开国产印铁制罐业先河的康元制罐厂以“勤、俭、诚、勇、洁”为厂训^[15]。这些企业的训示对儒家仁道思想从不同角度作了近代性诠释，对企业经营管理者 and 员工的为人处事予以指导和规范。

二是秉承义利合一的经营之道。近代儒商企业家在坚持儒家以义制利和以义取利原则的前提下，强调利的重要性，主张义利并重，建构起“义利合一”的近代商业伦理观。张謇对义利作了新阐释：事关人民生计，“两利上也；利己而不利人，次之。若害大多数人而图少数人之利，必不可。”^[16]利对做生意很重要，但利己不能损人，“人之道，端赖养成。寻常商业，虽卖贵买贱，皆有计心，而利己损人，必为众弃。”^{[5]202}经元善以义利并重作为商业宗旨，反对商人一味逐利，说“锱铢必较，实非本性所近，且所觅蝇头，皆是末中之末”^[17]。穆藕初主张因义生利，兼顾公义和私利，批评一些商人重私利而不讲公利：“每有微利可图，则群起拾挾，奸伪贪诈，恬不为怪，人方精益求精，而我乃得过且过，甚且冒牌戕影，视同固常，徒见目前之小利，而不顾信用之丧失。”^{[18]205}火柴大王刘鸿生反对片面追求个人利益，倡导“与人便利，于己得利”，声称：“你要发大财一定要让你的同行、你的跑街和经销人发小财。有饭大家吃，不可一个人独吞。最愚蠢的人，就是想一个人发财，叫别人都倒楣。”^{[19]67}可见，近代儒商建构的义利并重和义利合一观，是中西商业伦理观有机融合的产物。

三是以诚信为本，做忠信之商。许多近代企业家视诚信为经营道德准则，在他们看来，经商之人做事待人必须要诚实守信，尽心尽力，不能弄虚作假。经元善对“诚”高度重视，说：“学问之道，入手是一个诚字，欲寻诚字门径，当从妄语始。诚求诚应，诚之至，金石能开；不应不开，诚未笃也。诚者，真实无妄之谓也。”^[20]荣德生谈到经商之道时说：“其行为必孝梯，其任事必诚笃，其待人必忠

信，对社会义务必肯尽力，经营事业，不图居奇，不取意外之财，谨慎从事，勉为良善。”^{[21]155}关于商人的忠信，他说，“与商人言忠信，似乎高远，而理实浅近”，“劝用国货，抵制外货，此忠之存心也，意必有信用也”^[22]。他将使用国货和抵制外货作为近代商人忠信的内容，反映了近代民族主义色彩。有些企业家把商业信用看得重于性命。如穆藕初将“重信用”列为企业家精神的首要条目，认为要防止中国近代棉纺织业衰败就要重拾固有商业道德，说：“我华商向重信用，第自革政以来，商业道德，日就沦丧，其殆受恶政治之影响使然耶？抑社会多数自行堕落致此耶？……苟不及早觉悟，革除此项积弊，棉花业一败涂地之日不远矣。”^[23]显然，“重信用”包括了近代意义的契约精神，与依法经商的法治观念是不谋而合的。

四是弘扬自强不息和勇于创新的精神。自强不息和勇于创新是易学的思想精华，同样是现代企业的生命和精神所在。中国近代民族企业的发展处境十分艰难，外有西方企业的竞争和排挤，内有封建官府和官僚企业的压迫和吞并。然而，许多民族企业家没有被困境吓倒，而是发扬儒家自强不息和开拓创新的精神，使近代民族工商业在困境中求生存和发展。有学者将这种积极进取和勇于创新的精神概括为五个方面：积极引进股份制；不断更新设备和改进工艺；大力推进近代化管理；开发新产品和新产业；不断开辟新市场^[24]。荣氏兄弟就特别重视吸收西方近代企业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模式，荣宗敬在总结企业兴办经验时说：“茂、福、申新各厂得力于：造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开工力求其足，扩展力求其多，因之无月不添新机，无时不在运转；人弃我取，将旧变新。”^[25]银行家陈光甫对改革与创新作了精辟阐述：“能有创造之精神，仍完全在于改革，更在于继续不断的改革。故有创办之精神不足为奇，仍须有勇猛改革的精神，创办而改革，改革而成功，成功再改革，改革又成功，俾创办改革成功三事循环不断，周而复始，一直向上进展，此即所谓自强不息也。”^[26]他在银行事业上的自强不息就是通过不断改革和创新实现的。

五是富有克己敬业的精神，恪守勤俭守成的美德。敬业和勤俭是儒家倡导的创业和守业的美德，该传统被近代儒商发扬光大。许多企业家以强烈的事业心和敬业精神克服企业生存和发展面临的各种困难。卢作孚提出了“事业中心论”，“凡

现代的事业,都是公众的事业,必须每一个人为了公众,即亦必须每个人依赖着公众”,“每一个人都依赖着这个事业,一直到老;而每一个人的努力,亦一直到老为着这桩事业、这个目的,纯在造成一个社会,而非为着个人。”^[27]正是这种强烈事业心使民生公司发展成中国近代最大民营航运公司。陈光甫金融事业的成功亦在于其强烈的事业心,他说:“人生在社会有一真正快乐之事……是树一目标,创一事业,达到目的地及成功,为最快乐。此种快乐是从艰危困苦中得来,尤为永久,尤为有纪念价值。”^[28]“勤俭”则是企业家致富后守业的保障。著名实业家聂云台提倡勤俭的生活,说:“盖礼教与俭约者,中国文化之美粹也。”^[29]荣德生认为社会进步后亦要勤俭知足,否则必起争端,“所以吾国将来工业发达,生产大增以后,必须保持知足,提倡古训,人人勤俭,衣食自足;地上生产,地下启发,生活物质,无虞匮乏。”^{[21][22]}他家财万贯,却常年穿着布衣、布袜和布鞋,一生不沾烟酒,一张白纸也舍不得浪费。卢作孚声称中国人有两种美德可以战胜世界上任何民族,即勤和俭。他在公司倡导和开展勤俭运动,“大胆生产之谓勤,小心享用之谓俭”,目的是要去除职工骄奢淫逸的旧习,“逐渐减少以至于无,而能够俭以养廉”^[30]。可见,近代儒商不仅视敬业和勤俭为传统美德,还将其与近代实业兴办成功与否相联系,赋予了两者近代的思想特色。

六是有浓厚家国情怀,走实业救国之路。近代中国面临的最大危机是民族存亡问题,因此,许多民族企业家将“实业救国”作为兴办实业的终极目标。他们舍个人和企业之小利,求民族和国家之大利,是对传统儒商家国情怀的升华。荣氏将救国救民视为兴办实业的目的,荣宗敬回顾三十年企业人生时说:“余不敢谓于社会、国家有所裨益,惟力之所能为者,任何艰苦困难在所弗辞,亦聊尽国民一分子之义务而已。”^[31]穆藕初深刻阐发了如何正确认识为国家民族谋福利与个人谋福利的关系,说:“工厂对于国家的贫富强弱,民族的兴衰存亡,关系如此密切,因此我要郑重地大声疾呼,办工厂的目的应该是为国家民族谋福利,而不是仅仅为私人获取利润。办工厂的人应该把握住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观念,而把私人的利益搁在后面,因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32][49]}在抗战中,他号召实业家支持抗日救亡,把生产经营与抗日救国相联系。刘鸿生被中国工商界前辈胡厥文誉为

“爱国心长,义无反顾”^[33]。他创办鸿生火柴厂时面对着日本等列强企业的排挤和打击,感受到国家与企业是休戚与共的,只有申明国家民族大义,才能换来企业之利,故提出“完全国货”的宣传口号。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公司以“富强国家”为经营宗旨之一,希望“用事业的成功去影响社会,达到改变国家落后面貌,实现国强民富的目的”^[34]。

七是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热心公益慈善事业。许多近代企业家还大力兴办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将回馈社会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张謇提出“衣食之源,父教育而母实业”^[35],认为实业和教育的近代化同等重要,“然则图存救亡,舍教育无由,而非广兴实业,何所取资以为挹注。是尤士大夫所当兢兢者矣。”^[36]因此,他在南通大力普及和推广新式教育,使南通成为中国近代教育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陈光甫将“服务社会”确立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营业宗旨,称“这四个字,实在是本行生活的要素,第二的生命,无论政局如何变化,环境如何恶劣,思想如何更换方向,……然而这‘服务社会’四个大字的精神及应用方面,却始终如一,丝毫不改”^[37]。民族化学工业之父范旭东被毛泽东称为“四大民族资本家”之一,先后创办和筹建久大精盐公司、久大精盐厂、永利碱厂、永裕盐业公司、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等企业。他把“我们在行动上宁愿牺牲个人,顾全团体;我们在精神上以能服务社会为最大的光荣”^[38]列入公司职工必须共同遵守的四大信条之中。近代民族企业家以参与公益事业、回馈社会民众作为更高的追求,使其企业经营具有崇高使命感,展现了近代儒商高尚的精神境界。

综上可见,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适应社会发展和时代要求,既积极吸收和借鉴西方企业文化和资本主义经济精神,又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商文化,建构起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近代儒商文化。

三、对传统儒商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要回答近代儒商是如何继承和发展了传统儒商文化,就要先认识和把握传统儒商文化的内涵及其基本内容。目前,有关传统儒商文化的界定和阐述大体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有关“儒商文化”的研究,基本属于狭义的文化,即精神层面的文

化;二是有关“儒商精神”的研究,大体属于儒商精神层面的文化。^①可见,狭义的儒商文化和儒商精神研究实际是同一个问题。综合目前的各家观点,笔者以为,可以对传统儒商文化作如下界定:传统儒商文化是中国古代儒商把儒家文化与商品经济法则相整合所形成的经营理念、管理思想、行业准则和行为规范。传统儒商文化的内涵主要包括六方面内容:

1. 仁道的核心价值观。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也是儒家的根本价值观,是标志人的道德品格和政治理想的范畴。仁既对儒学其他概念和价值有统摄性,又包含多元的发展维度。传统儒商奉行儒家仁学思想,以仁道和仁爱作为商业经营管理的核心价值观。仁道及其内含的仁本、仁爱和人本等理念构成了传统儒商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在儒商文化的建构中有着本源性、决定性的地位和作用。

2. 义利兼济的商道。义和利是标志道德原则和物质利益的一对范畴。义,是指道德行为之当然;利,是指物质利益。利有私利和公利之分。凡是片面追求个人物质利益,损害国家和社会利益的,为私利;凡是谋求国家和社会利益的,为公利。如何看待义利关系是社会主体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问题,更是商人考虑的首要问题。因为,经商必然要讲利和求利,这是商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儒家特别重视义利之辨,主张在以义为先和为本的基础上取利和求利,主张以义制利、以义取利、义利合一和见利思义,强调公利优先,反对唯利是图。传统儒商秉持儒家义利观,形成了义利兼济的商道。

3. 诚信为本的经营原则。在儒家思想中诚与信主要是指君子和圣人的品质。先秦儒学视诚与信为君子道德修养的要求,规定了儒者方方面面的生活,以诚成己,以诚接物,以诚待人。当时,诚信并未与商业活动发生直接关联。诚信作为儒者的德行要求被明清儒商加以吸收和发展并付诸实践,成为规范商业经营的伦理准则。可以说,诚信经营是传统儒商从事商业经营的生命线,这在有关儒商事迹的文献中有大量记载。

4. 创新进取的职业精神。追求创新和积极进取是儒家的重要品格。儒家经典《大学》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集中体现了儒家的创新精神。同时,儒家的人生又是积极进取和富有道德的,此即《易经》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不过,儒家认为“变易”中有“不易”,此即“常”和“道”。“易”与“不易”是对立统一的,“变”需要创新进取,而常(道)则具有永恒性,即创新进取的内在本源和道德依据。传统儒商融合这些思想形成了本于天道的创新进取精神。

5. 克己敬业的管理理念。先秦儒家的“敬”可以分为敬人、敬事、敬天(道)。由于道为儒家伦理提供了普遍的依据,敬天就是以普遍性的道德要求来做事待人。敬人意味着待人真诚,与人为善,把人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敬事则要求在事中磨练,有所作为。宋明理学对此作了发展,使“敬”衍生出恭敬肃穆和严谨专注的修养功夫,包含了随处行事的认真态度,成为君子修身求道的必备功夫。克己敬业不仅是对商业经营管理者的要求,也是对普通从业人员的要求,以形成良好的经营商业环境。

6. 热心公益慈善的家国情怀。先秦儒学并没有明确阐述公益慈善问题,但是,其仁爱论、性善观、民本思想、大同思想和义利观却为后世慈善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宋明理学对公私观的丰富和发展,则为传统的公益慈善观建构提供了新的理论来源。传统儒商将这些思想与佛教和道教的慈善观相融合,建构起儒商的公益慈善观^[1]。

通过本文第二部分的阐述,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儒商对传统儒商文化的六个方面都作了传承和发展。

1. 关于仁道的核心价值观。近代儒商奉行儒家仁学思想和传统儒商仁道经营理念,根据时代要求和社会需要对其加以阐发,以仁道和仁爱作为商业或企业经营管理核心价值观。

2. 关于义利兼济的商道。近代儒商既继承了义利兼济的传统商道,又赋予其近代内涵,这主要

^①以“儒商文化”为题的著述主要有:邵作昌、王永超主编:《儒商文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宋长琨:《儒商文化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戢斗勇:《以义取利的生意经——儒商文化》,山东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等。以“儒商精神”为题的著述主要有:戢斗勇:《儒商精神》,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唐凯麟、罗能生:《契合与升华——传统儒商精神和现代中国市场理性的建构》,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张启元:《儒商精神与企业管理》,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等。

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提升“利”在义利关系中的地位,主张义利并重和义利合一;二是面对近代频仍深重的民族危机,特别强调谋取个人和企业私利要服务于民族国家之大义和公利。

3.关于诚信为本的经营原则。近代儒商将近代法治精神和传统儒商诚信经营精神相结合,认为只有秉持诚实原则,才能使商业经营正常开展和顺畅运作,使商业经营得到长期生存和健康发展。近代儒商在商业经营上,树立了诚信经营的典范。

4.关于创新进取的职业精神。受儒家中庸和中和观念的影响,传统儒商这方面的表现并不明显。近代儒商的生存环境是十分艰难险恶的,为了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特别是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压制中求得发展,他们勇于创新 and 锐意进取,战胜和克服了许多危难和困境。

5.关于克己敬业的管理理念。近代儒商将其引入商业职业伦理,同时结合近代西方企业管理契约理论,形成了有近代色彩的克己敬业管理理念。

6.热心公益慈善的家国情怀。近代儒商吸收西方慈善公益观对传统慈善公益观作了近代转换,以近代民族国家观、社会观和民众观等改造和丰富传统的“公”的观念,建立了近代儒商的慈善公益观。他们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慈善活动,成为近代慈善公益事业的主力。他们还大力投身近代民族爱国运动,成为近代中国民族爱国事业的主力军之一。

中国近代儒商在传承中国古代儒商文化的基础上,根据社会发展和时代要求对儒商文化作了新发展,体现了近代精神。马敏说,近代儒商文化“是儒家经世致用、修齐治平等价值观念在近代条件下的应用、展开和变异,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近代儒商具有更加强烈的救亡图存意识,更为强调自己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更加重视推广新式教育,建立商人社团,实行商人自治、地方自治,以天下为己任”^[3]。近代儒商文化上承传统儒商文化,下启现代企业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民族文化特色,初步实现了传统儒商文化的近代转型。

四、近代儒商文化力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

与西方近代商业文化片面崇尚工具理性不同,中国近代儒商文化着力弘扬儒家道德精神,力求道德性的价值理性和功利性的工具理性相统

一,形成了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近代儒商文化。这在近代儒商的义利观上有着集中体现。

人是理性动物,其社会实践或行动主要受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所支配。德国社会学家韦伯认为,人的社会行动有四种取向:工具理性的、价值理性的、情绪的、传统的,其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行动是最重要。所谓工具理性的取向,“它决定于对客体在环境中的表现和他人的表现的预期;行动者会把这些预期用作‘条件’或者‘手段’,以实现自身的理性追求和特定目标。”^{[39][114]}易言之,工具理性是以行动能否成为达到目的的有效手段及其选择的手段是否最有效率,即追求功利为目的,亦称“功效理性”。它关注的是客观世界,又被称为科学理性或科学工具理性。所谓价值理性的取向,“它决定于对某种包含在特定行为方式中的无条件的内在价值的自觉信仰,无论该价值是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还是其他的什么东西,只追求这种行为本身,而不管其成败与否。”^{[39][114]}易言之,价值理性看重行为的“绝对价值”,即行为自身的价值,不计较手段和后果。它关怀的是人文世界,尤其是道德精神世界,亦称为道德理性或道德价值理性。最能体现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关系的便是义利关系。因为,义与利是标志道德原则和物质利益的一对范畴。义,指道德行为之当然,属价值理性;利,指物质利益,属工具理性。如何看待义利关系即是如何看待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关系问题,是人思考和处理各种事务的根本原则。儒家便将义利之辨视为儒学的根本问题。程朱理学的开创者程颢说:“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事惟义利而已。”^[40]程朱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更是强调:“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41]义利观是商业伦理要处理的核心问题,因为,求利是商品经济的根本目的,如何求利则是持“义”必须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义利观对其它商业伦理具有统摄性。义者,“宜也”,是指道德行为之当然或应然。在商业伦理中,“宜”的内涵便是指商业伦理的具体内容和要求。

两种理性是人类各种文化共有的,然而,不同的文化对两种理性的认识不同。西方近代文化本质是工具理性主导的,工具理性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西方实现了现代化。韦伯在阐释西方资本主义及其文明时就将其归为工具理性的产物:“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从理

性主义对于生活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中演绎出来。”^{[42]56}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是生产活动的理性取向”^{[43]26},“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会完成世界的祛魅(经由认同科学进步),将社会关系的所有形式转化为接近目的合理型的行为(经由科层组织的理性协调),推动体现在国家之中、构成现代‘合法秩序’的主要形式的抽象、法理类型的进一步拓展。”^{[43]31}资本主义的理性特征主要表现为:“拥有独立的可任意处置的物质生产资料;具有自由市场,具有合理的簿记会计制度;管理是有依据、可预测的;劳动力是自由的;经济生活是充分商业化的。物质生产资料可通过社会现有的物质生产水平达到,而自由市场、有规律的管理等方面的理性化则必须以一种对社会加以约束的规范的存在为前提。”^[44]伴随着新教伦理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理性精神和社会制度是近代西方特有的,“为什么科学的、艺术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发展没有在印度、在中国也走上西方现今所特有的这条理性化道路呢?”这“实际上是一个关于西方文化特有的理性主义的问题”^{[42]15}。所谓西方文化特有的理性就是指主导西方资本主义生成发展的工具理性。

儒家文化却崇尚人文道德理性,是道德理性主导生成和发展起来的文化。儒家的义利观集中体现了这点。儒家对义利关系的认识主要有两派,即先秦的孟子和宋明理学重义轻利或强调义的优先性,这是主流;先秦的荀子和南宋的功利主义学派是义利并重和强调利的重要性,这是支流。儒家的义利观虽有上述分歧,但都主张“义”是本体性的“体”,“利”是工具性的“用”。传统儒商文化对儒家的义利观作了改造,在恪守义的本体性的前提下,强调了利的重要性。其优点是以义取利和以义制利,反对不义之利;其缺点则是多从主从关系来看待义利关系,坚持义的本体性,将利置于从属地位,往往导致重义轻利。中国传统社会判定儒商的标准是其“义行”,而非商业成就上的“利功”,明清文献、特别是方志为商人所立的碑传基本是“义行传”便是有力的证明。所以,要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就要对传统儒商的义利观进行近代性转换。中国近代儒商对传统义利观的近代转换,其理论表现是:充分吸引西方近代商业文化重视功利的工具理性思维和价值观,提升利的地位和作用,对利的内涵和重要性作了近代性阐释。其实践表现是:大力发展近代实业,主张求富

求强,走实业兴邦和实业救国的道路;在企业经营管理上,借鉴近代资本主义经营机制和科学管理;在生产技术上,大力引进科学技术和先进机器设备等。

然而,近代儒商在对传统义利观作近代性阐释时没有停留在全盘照抄西方的层面上。他们在强调利的重要性和赋予其新内涵时,又主张义利兼济、义利并重或义利合一,甚至坚持义的本位性;公利重于私利,个人和企业的“私利”要服务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公利”。张謇主张以义为先,“吾国人重利轻义,每多不法行为。不知苟得之财,纵能逃法律之惩罚,断不能免道德上之制裁。”^[45]利对做生意很重要,但利己不能损人,“人之道徳,端赖养成。寻常商业,虽卖贵买贱,皆有计心,而利己损人,必为众弃。”^{[5]202}经元善以义利并重作为商业宗旨,反对一味逐利,说:“锱铢必较,实非本性所近,且所觅蝇头,皆是末中之末。”^[17]火柴大王刘鸿生反对片面追求个人利益,倡导“与人便利,于己得利”,声称:“你要发大财一定要让你的同行、你的跑街和经销人发小财。有饭大家吃,不可一个人独吞。”^{[19]67}许多实业家将实业救国作为兴办实业的终极目标。刘鸿生被誉为“爱国心长,义无反顾”^[33]的实业家。穆藕初对如何看待个人、企业私利与国家、民族公利作了精辟阐述:“工厂对于国家的贫富强弱,民族的兴衰存亡,关系如此密切,因此我要郑重地大声疾呼,办工厂的目的应该是为国家、民族谋福利,而不是仅仅为私人获取利润。办工厂的人应该把握住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观念,而把私人的利益搁在后面,因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家经济如能发达,私人乐利不求自得。”^{[32]419}可见,近代儒商建构的义利观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结合,克服近代资本主义将工具理性(利)和价值理性(义)相对立或相悖的困境。

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及其文明过于推崇工具理性,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对立起来。韦伯便持此观点,“韦伯的方法论立场依赖于‘主观’与‘客观’、‘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的确立”^{[43]30},其社会学概念的基础,“即几乎接近理性的人类行动(在韦伯的两个主要观念上)必须立足于非理性(终极价值);但理性和价值之间有着基本的二元对立。”^{[43]38}结果是唯工具理性论盛行,价值理性被忽略乃至被遮蔽,给资本主义和人类社会发展带来深刻危机,“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显著效用极

大地强化了它的合法性,使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工具的范畴,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衡量、规范和裁判人类行为合理性最权威的标准,甚至逐渐取代了价值尺度,成为一种崇拜或信仰的对象。……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排斥,正是现代科学危机的症结之一,也是现代社会陷入精神危机的根源之所在。”^[46]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西方思想界就开始批判工具理性文明所带来的危机。连推崇工具理性及其成就的韦伯对此也予以批判,但又感到无助,“在韦伯的对现代性悲观的、听天由命的评价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它否定了各种关于进步的幻想”^{[47]85};因为,资本主义理性创造了一个越来越压抑和受束缚的环境,“韦伯把这种束缚比作某种监狱,或者是‘铁笼’,在其中,理性生产的制度包围了具体个人。”^{[47]88}

综上所述,中国近代儒商文化建构了不同于西方的商业文化体系,彰显了近代儒商着力传承道德理性的文化特色。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儒家为文化传统的东亚地区经济有了长足发展,现代化取得巨大成就,韦伯儒家伦理阻碍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观点“也随之受到了激烈的冲击”^[48]。这进一步说明了近代儒商文化重视价值理性,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并重的商业文化发展道路是合理的,中国当代儒商文化的重建和复兴无疑要以此为鉴。

[参考文献]

- [1]徐国利.中国古代儒商发展历程和传统儒商文化新探[J].齐鲁学刊,2020(2).
- [2]江怡.民营经济发展体制与机制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266.
- [3]马敏.近代儒商传统及其当代意义——以张謇和经元善为中心的考察[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8(2).
- [4]张謇.钱翁[M]//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第7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191.
- [5]张謇.改革全国盐法意见书[M]//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第4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 [6]经元善.挽救中国本原迂言[M]//虞和平.经元善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66.
- [7]经元善.又致盛京卿书(1899年5月)[M]//虞和平.经元善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 [8]荣德生.乐农自订行年纪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9]穆藕初.实业上之职业教育观[M]//穆藕初.穆藕初自述.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188.
- [10]陈光甫.1945年10月在纽约发致告同人立命寄言[M]//傅国涌,周振新.金融的原理·陈光甫言论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6:210.
- [11]经元善.五誓斋记[M]//虞和平.经元善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03.
- [12]蓝寿荣.中国金融文化:金融企业文化研究[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27.
- [13]周小鹏.周学熙传记汇编[G].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341.
- [14]马寿颐,赵孟然,宋廷璋.宋则久与天津国货售品所[G]//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天津文史资料选集:第16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106.
- [15]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民族资本创办和经营的工业)[G].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615.
- [16]张謇.为南通保坍事告全国及南通父老书[M]//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第4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374.
- [17]经元善.富贵在天说[M]//虞和平.经元善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05.
- [18]穆藕初.中国实业进行滞缓之原因[M]//穆藕初自述.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
- [19]刘念智.实业家刘鸿生传略——回忆我的父亲[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 [20]经元善.姚江折柳序[M]//虞和平.经元善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30.
- [21]荣德生.乐农自订行年纪事续编[M]//荣德生.荣德生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22]荣德生.人道须知[M]//荣德生.荣德生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67-368.
- [23]穆藕初.振兴棉业刍议[M]//穆家修,柳和城,等.穆藕初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48.
- [24]章开沅,马敏,朱英.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研究(1860—1919)[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97-303.
- [25]李国伟.荣家经营纺织和制粉企业六十年[M]//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商史料(1).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6.
- [26]陈光甫.1932年9月28日总经理处会议谈话[M]//傅国涌,周振新.金融的原理·陈光甫言论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6:115.
- [27]童少生.忆民生轮船公司[M]//王永林,凌耀伦.卢作孚追思录.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187-188.
- [28]陈光甫.1930年12月26日在天津与同人聚餐谈话[M]//傅国涌,周振新.金融的原理·陈光甫言论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6:29.
- [29]弘化社.廉俭救国说[M].上海:佛学书局,1934:8.
- [30]李金铮,邓泓.民生公司的人事管理[M]//王永林,凌耀伦.卢作孚追思录.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364.
- [31]荣宗敬.总经理自述[G]//无锡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无锡文史资料:第28辑.无锡:无锡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印行,1993:16.
- [32]穆藕初.科学管理[M]//穆家修,柳和城.穆藕初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 [33]胡厥文.序[M]//刘念智.实业家刘鸿生传略——回忆我的父亲.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序.
- [34]卢国纪.我的父亲卢作孚[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66.
- [35]张謇.通州中学附国文专修科述义并简章[M]//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第5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111.

- [36]李明勋,尤世玮.张謇日记[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566.
- [37]陈光甫.资本主义的一条新出路何品,[M]//宣刚.陈光甫日记言论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5:183.
- [38]傅国涌.大商人——影响中国的近代实业家们[M].厦门:鹭江出版社,2015:257.
- [39]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第1卷[M].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 [40]程颢.明道先生语一·师训[M]//河南程氏遗书:卷11.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集成.
- [41]朱熹.与延平李先生书[M]//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24.四部丛刊·集部.
- [42]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于晓,陈维纲,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 [43]吉登斯.政治学、社会学与社会理论——经典理论与当代思潮的碰撞[M].何雪松,赵方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 [44]朱国宏.经济社会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583.
- [45]张謇.商校本科毕业演说[M]//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第4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443.
- [46]陈新夏.唯物史观与人的发展理论[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196.
- [47]米歇尔·洛威.马克思和韦伯:资本主义批判[M].林进平.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24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
- [48]王容芬.出版说明[M]//马克思·韦伯.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3.

责任编辑:徐希军

Formation of Confucian Merchants in Modern China and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Culture

XU Guoli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Confucian businessmen are businessmen with good moral character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who take Confucianism as the management criterion and life guidance. With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capitalism and national bourgeoisie in modern China, Confucian businessmen came into being among Chinese modern national enterprises. They not only actively absorbed the modern western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ideas and scientific management, but also inherited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merchant culture and constructed the modern Confucian merchant culture. The culture of modern Confucian merchants mainly includes seven aspects.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 modern commercial culture which advocates the utilitarian instrumental reason one-sided, the modern Confucian merchant culture promotes the Confucian humanistic spirit, unifies the moral value reason and the utilitarian instrumental reason, and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 justice and interest in unity and equal emphasis on justice and interest, which forms the commercial culture with Chines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Confucian businessmen in modern China; modern Confucian merchant culture; instrumental reason; value reason; the view of justice and interests